

金融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分析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王常雄¹, 吴晓俊², 钱海刚³

(1.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济南 250100)

(2. 苏州大学商学院, 苏州 002103)

(3. 财政部财科所, 北京 100142)

摘 要: 对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缓慢的解释主要来自人口流动以及产业和城市经济发展方面, 但是,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提高明显受制于城市最佳人口规模的扩大, 即城市的容纳能力。通过对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0—2006年共计7年的数据进行面板分析的结果表明, 金融业发展水平对城市化水平有很显著的促进作用。金融业发展水平的不足将抑制企业创造就业的能力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进而减缓了城市化步伐。为促进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应加强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 加大城市公共支出方面的金融创新力度以及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

关键词: 金融发展; 城市化; 城市最佳规模; 面板分析

中图分类号: F2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772/j.issn.1009-8623.2009.07.006

一、引言

目前, 我国城市化水平约43.9%, 根据钱纳里的观点, 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达到25%时, 城市化即进入了加速期。我国早在1987年的城市化水平就达到了25.32%, 按照西方主流观点, 我国的城市化应该飞速发展, 进入加速通道。但现实情况是, 20年来, 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每年提高仅1%。为什么我国的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众多学者往往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 将其归咎于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战略导致的户籍制度。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难道仅仅受制于户籍制度? 究竟城市化的驱动力来自什么? 城市化提高的瓶颈又是什么? 更多的论断分析来自于规范分析, 有影响的实证分析并不多。本文的分析视角是金融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 具体可转化为金融发展对城市

最佳规模、对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的影响机制分析。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 金融业的发展水平和金融结构对城市化的影响非产显著, 这对城市化发展的思路对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回顾

专家和学者对城市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研究的:

一是人口流动角度。这一角度的研究思路仍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刘易斯(1955)指出: 经济发展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农村人口向城市地区的转移, 即城市化的过程。这种两部门的二元经济是19世纪以来全球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发展的真实背景写照。Todaro(1973)构建的模型显示: 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否的

第一作者简介: 王常雄(1982-), 男,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国民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转轨经济。

收稿日期: 2009年3月23日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2006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项目编号: 06JZD0015)的阶段性成果。

决策依据是迁移后的工资收入与其找到工作的概率的乘积和迁移前收入的差。在托达罗模型中,影响城市化的因素不是城乡实际收入差距,而是城乡预期的收入差距。托达罗把刘易斯的两部门二元经济模型修正为了三部门、二元经济模型,即农业部门、城市传统部门和城市现代部门。事实上,考虑到城市中存在传统部门,迁移具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蔡昉(2003a)等人认为,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的关键有赖于户籍制度改革的突破,即打破“户口”的制度性福利。从人口流动、迁移的角度来探讨城市化仍是目前我国城市化分析的主流,但基本未将金融业发展纳入城市化的分析框架中。

二是产业和城市经济角度。这一方面的研究假设人口流动没有限制,基本观点是城市化主要受制于城市的容纳能力。Vernon Henderson等(1997, 2001)通过对美国、日本、韩国、巴西的大都市圈的研究发现,城市的产生和扩张都是起因于专业化,城市化水平和专业化水平是正相关的。城市的规模取决于该城市的专业化分工水平。专业化水平越高,城市的最佳规模越大,城市化水平也相对较高。Henderson强调,金融业的发展对其他行业的融资方面的支持非常重要,有利于促进制造业等行业的规模经济。因此,金融业水平较高的城市往往受益于前者对其他行业以及中小企业的积极溢出效应,提高了城市的最佳规模,从而提高了城市化水平。Qadeer(2004)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很容易陷入过度城市化的陷阱,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在城市公共支出方面不足,使得城市的最佳规模不足,因此,一旦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加剧,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会出现缺口,这使得城市化流于人口城市化的形式,难以可持续发展。他认为,必须加大在公共建设等方面的金融支持,提高城市的最佳规模,进而提高城市化水平。Luisito bertinelli等人(2003)发现,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往往城市集中度特别是首位度非常高的特点,但其它城市的人口往往非常小,城市的人口聚集不是分工和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政治性中心的“政治红利”的结果,这恰恰反映了这些国家的城市容纳能力有限。由于金融、物流、交通等配套的软环境建设不足,

城市化出现很多问题,如犯罪频繁、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等问题,城市的规模难以扩大,以至于Henderson等人(2006)发出了“中国城市规模是否太小”观点。蔡昉、都阳(2003b)思考了城市化驱动力的问题,他们认为,在改革开放前,城市发展的动力主要是依靠行政的力量以再分配的方式获取资源;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发展的动力变成了市场经济力量主导的城市自我融资能力和专业化分工水平。洪银兴(2000, 2003)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从城市规模和容纳能力思考城市化问题的专家之一,他认为,城市化的过程不应仅仅局限于人口的转移,城市化的过程实际上表现为两个方面,即资本、企业、服务业和市场体系等向大城市的转移和流动,以及工厂、部分制造业流出城市的过程。因此,金融业在城市的集聚和壮大是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并对城市化的速度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

从两方面的文献看,前者侧重于人口流动与迁徙的分析未考虑金融发展,而后者尽管认为,城市容纳能力,即城市最佳规模的大小决定了城市化的水平,也不否认金融业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但仍未进行相关的实证分析。金融发展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城市化水平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仍未有学者进行深入剖析,在金融发展与城市化的政策建议方面也几乎没有相关研究,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空间。在方法上,做城市化实证的文献中,钟甫宁(2004)等人用横截面数据分析了南京的城市化驱动因素,用面板数据分析城市化的文献较少,为了更好地反映金融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我们尝试用省际面板数据来分析金融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

三、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一) 计量模型

为了实证金融发展水平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我们建立了如下面板数据回归方程

$$URit = \alpha_i + \beta_1 \ln FDI_{it} + \beta_2 \ln FAI_{it} + \beta_3 \ln FEL_{it} + \beta_4 \ln FDI_{it} + \beta_5 SDR_{it} + \beta_6 \ln RD_{it} + \mu_{it} \quad (1)$$

其中,在上述方程中, i 和 t ($t=2000, \dots, 2006$)分别表示第 i 个省份和第 t 年。

为研究金融发展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我们以城市化水平(UR)为因变量,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自变量及其选择依据:

金融发展水平(FDL):众多文献表明一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发展,但金融发展水平是否能够促进产业集聚水平仍然有待研究。我们假设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产业集聚水平也越高。我们借鉴朱恒鹏(2007)的研究,将一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以M2/GDP表示。

固定资产投资(FAI):城市化的一个重要驱动力来源于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的城市规模扩大。我们假设固定资产投资越高,城市化水平也越高。本模型取固定资产投资的对数。

外贸水平(FEL):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能够极大地转移农村人口。我们假设进出口额越大,城市化水平越高。外贸水平以各省市的进出口额表示。本模型取进出口额的对数。

吸引外资能力(FDI):目前,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在促进城市就业人口的增加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又进一步提高了城市化水平。我们假设外商直接投资越高,城市化水平越高。FDI用各省市实际吸引外资金额表示,本模型取FDI的对数。

服务业比重(SDR):蔡昉等(2004)指出,生产型服务业或消费性服务业往往位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远高于制造业的。我们假设服务业占当地GDP的比重越高,城市化水平也越高。

研发水平(RD):研发水平的提高尽管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但高新技术的发展往往对就业却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因此,研发水平对于城市化基本没有多大影响,甚至可能起抑制作用。我们假设研发水平越高,城市化水平越低。研发水平用各省市的研究开发费表示,本模型取研发费用的对数。

(二) 数据来源

我们选取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0-2006年共计7年的数据作为分析的对象。如未特别指出,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00-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以及各省的

统计年鉴。

(三) 实证结果

利用Stata10.0根据式(1)对7年间31个省市的数据进行回归,得到下表的实证结果。在使用面板分析时,先要进行模型设定检验以决定使用哪种形式的面板数据模型。具体检验方法如下:首先使用沃尔德F检验,拒绝原假设说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OLS,然后利用BP-LM检验,拒绝原假设说明随机效应模型优于OLS模型。最后利用Hausman检验,如果拒绝原假设,则用固定效应模型,否则用随机效应模型。在本例中,豪斯曼检验均在1%水平下拒绝随机效应,故固定效应模型效果更好。实证结果显示,金融业发展水平对城市化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且作用较明显。

此外,固定资产投资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固定资产投资在扩大城市就业和提高城市最佳规模方面有显著作用。固定资产投资的加大能显著提高城市化水平。

外贸水平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也十分显著,大进大出的经济结构不仅能扩大就业范围和提高就业水平,还能对各行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这进一步提高了城市的容纳能力。进出口规模大的省份如浙江、江苏的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且增长速度也较快。

第三产业比重对城市化促进作用十分重要,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水平比第二产业高很多,这使得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水平高的地方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而重工业比重高的地区,往往存在重工业的“机器吃人”现象,即对劳动力的挤出效应,这进一步抑制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东北地区由于毗邻俄罗斯是我国传统的重工业基地,四川、陕西等西部多山或地形不平坦的地区符合国防工业“山、散、洞”的选址标准,重工业比重非常高,庞大的农村劳动力甚至城市劳动力都无法被吸纳,城市化水平提高异常缓慢。

值得指出的是,研发水平对城市化似乎并无促进作用,且不显著,原因估计是研发投入越高,产业结构中资本相对劳动的比重也越高,生产型服务业未充分发展前,城市化水平难以提高,甚至可能下降。此外,目前我国的研究主体仍是以国家研究所、大学等形式,研究成果的应用推广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固定效应模型 1	固定效应模型 2
ln(FDL)	0.0091*** (3.387)	0.0088*** (3.414)
ln(FAI)	0.0028*** (2.946)	0.0031*** (2.968)
ln(FEL)	0.0021*** (4.275)	
ln(FDI)		0.0037*** (4.659)
SDR	0.0187*** (3.245)	0.0165*** (3.152)
ln(RD)	-0.0124 -0.482	-0.0157 -0.325
Constant	5.317*** (3.181)	5.942*** (3.447)
Observations	217	217
省分数	31	31
R ²	0.63	0.59

注：() 中的值代表t值，*、**、***分别代表有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被解释变量为UR。

和商业化不够，研究开发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溢出效应不够，对推动就业几乎没有多大的作用。

(四) 金融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的原因分析

以上的面板数据分析只能从统计学的角度告诉我们金融业发展对城市化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于金融业发展为何促进、如何促进城市化仍然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入剖析。我们认为，金融业促进城市化的水平提高的原因主要如下：

首先，金融业促进对劳动密集型行业 and 中小企业的发展进而提高就业水平。目前，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竞争非常激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已从廉价劳动力转化为金融支持强度、客户关系管理、战略执行能力等差异化优势。强大的金融业能够为劳动密集型行业提供较大的资本，从而促进后者的发展。中小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就是金融歧视，金融业发达的地区，中小企业的数量和质量都相对较高。像浙江、广东和江苏就是明显的例子。金融业越发达，作为吸纳劳动力的

主要部门，劳动密集型行业 and 中小企业发展速度也越快，城市最佳人口规模也就越大，其他条件一定时，城市化水平也就越快。

其次，金融业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支出方面的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各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以直接或间接融资的方式，如：银行贷款、BOT（建设—经营—转让）、资产证券化等方式进行。金融业水平越高，城市的生产配套能力（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活配套能力（水、电、煤、气）等方面越完善，这使得城市在扩大生产规模和吸纳更多农村人口的能力大增，城市化水平和速度都相对较快。事实上，金融业发达的沿海省份，如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等地的城市化率明显高于金融业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且金融业发达的沿海省份的城市化速度也呈现更快的特征。

为什么我国的城市化的整体水平相对较低？除了金融业发展水平较低之外，我们认为，可能与我国的金融业特定的“发展路径”有关。1997年以来，一方面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银行和金融机构防范金融风险的意识增强，银行往往采取更加严格的信用评价体系降低不良贷款概率，这就出现了所谓的惜贷现象；另一方面近十年来，我国的居民储蓄在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下，储蓄的热情不降反升。这导致货币供过于求。在放贷方面，民营企业的评级信息往往较少，所能获得的贷款相对较少，贷款主要流向国有企业（张杰，2000）。所以，银行和金融机构为找到了一个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的平衡点，不得不将贷款向享受政府优惠、拥有垄断利润的大型国有企业倾斜，期望以此减少风险，获取稳定的收益。这种信贷的“路径依赖”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使得大型既有国企的资本成本大大降低，资本代替劳动成为可能，资本深化使得这些企业吸纳劳动能力并不强（蔡昉等，2004）；而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则因为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惜贷而缺乏资金，发展受到很大制约。事实上，民营企业往往都位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这又抑制了就业机会的创造。金融业特定的“发展路径”使得城市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呈下降趋势，城市的最佳人口规模难以

大幅提高。因此,尽管许多地方政府将城市化作为主要的发展战略来推动本地的经济发展,但城市化水平仍难以显著提高。

四、政策建议

(一) 提升和转变金融机构的服务意识,加大对劳动密集型等行业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

鼓励国有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改变这些银行的服务意识,使得中小企业获得“国民待遇”;同时,国家应该鼓励和支持民营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其职能主要是为了同一个地区的中小企业融资,这些银行往往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和成本优势。

要提高城市化水平,重要的一点就是扩大就业,提高城市的吸纳农村劳动力能力,这意味着在提升产业结构的同时,劳动密集型等行业的中、小企业发展必须受到应有的金融支持。我国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特别要加大对纺织服装、轻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外向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力度,从而提高这些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进而提高城市最佳规模和吸纳农村流动人口的能力,最终提高城市化水平。

(二) 加大城市公共支出方面的金融创新力度,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

增加政府公共支出,大力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改善居民生活预期和生产消费环境,提高城市的宜居性,为城市化扫清障碍。建议各地利用其现有的城市建设投融资合作平台,打造更加合理的金融产品与贷款模式同时,通过开发出各种适应市政融资需要的金融工具和产品,来深化直接融资的范围和手段。

进一步健全、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尽快改变金融市场重要法律法规不全、某些重要金融活动无法可依的现象。只有金融业健康快速的发展,才能对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进而提高城市化水平。■

参考文献:

- [1] 阿瑟·刘易斯著,周师铭、沈丙杰、沈伯根译,1983:《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
- [2] 蔡昉、都阳、王美艳,2003a:《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

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 [3] 蔡昉,都阳,2003b:转型中的中国城市发展-城市级层结构、融资能力与迁移政策,《经济研究》第6期。
- [4] 蔡昉,都阳、高书文,2004: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著性就业?,《经济研究》第9期。
- [5] 洪银兴,陈受.城市化模式的新发展——以江苏为例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0,(12)。
- [6] 洪银兴,2003:《城市功能意义的城市化及其产业支持》,《经济学家》第2期。
- [7] 洪银兴.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 [8] 张杰,2000: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与融资次序,《经济研究》第4期。
- [9] 王立鹤,钟甫宁,陈卫红,2004:城市化发展驱动因素的实证研究-南京与同类城市比较分析,《中国软科学》第1期。
- [10] 张海波,吴陶.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Panel Data模型的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5,(12)。
- [11] 胥嘉国.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距以及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06,(06)。
- [12] 周宁东,汪增群.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项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J].财贸经济,2007,(05)。
- [13] 朱恒鹏,2007: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资本自由度指数:1999—2004,《财贸经济》第3期。
- [14] 李海平,蒋欢.地方政府与区域金融发展问题探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01)。
- [15] 马正兵.区域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时变特征与统筹对策[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01)。
- [16] 张静.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国内研究综述[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08,(01)。
- [17] 梁影勇,梁平,任思慧.中国金融发展与城市化关系的区域差异[J].上海金融,2008,(02)。
- [18] 张璟.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述评[J].商业时代,2008,(12)。
- [19] Kevin Honglin Zhang, Shunfeng Song,2003,“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ime-series and Cross - section Analys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14:386-400.
- [20] Luisito bertinelli, Eric Strobl, 2003, “Urbanization, Urban Concent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king Paper, CREDIT.
- [21] Michael P.Todaro,1969.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9, no.1:138-148.

- [22] Mohammad A.Qadeer,2004. "Urbanization by Implosion", Habitat International, Vol. 28, 1-12.
- [23] Stephen R. Cain, 1972. "Urbanization without Modernization", Ethnohistory, Vol. 19, No. 1, pp. 53-62.
- [24] Vernon Henderson,1997: "Medium Size Cities",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27:583-612.
- [25] Vernon Henderson, Becker 2001: "Political Economy of City Sizes and Formation," ,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48, pp. 453-484.
- [26] Au, Chun-Chung and J. Vernon Henderson, 2006, "Are Chinese Cities Too Small?"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73, No. 3, pp. 549-576.
- [27] Yaohui Zhao, 2002.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Return Migration: Recent Evidence from China"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30, pp.376-394.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the Urbanization ——based on inter-provincial annual data

WANG Changxiong WU Xiaojun QIAN Haigang

(1. Economics Depart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2. Business School,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002103)

(3. Research Institute for Fiscal Science Ministry of Finance R.R. China, Beijing 100142)

Abstract: The explanation to the slow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urbanization level mainly comes from the movement of population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and urban economy. However, the enhancement of our country's urbanization level is obviously restrained by the expansion of urban's most-favored population scale, namely urban accommodation capacity.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n the annual data of 31 provinces (municipality, autonomous region) from 2000 to 2006, we find that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industry has remarkably promoted the urbanization level. The insufficiency of financial industry development level will suppress not only the enterprise's ability of creating employment, but also the construction progress of city's infrastructural facilities, and will slow down the urbanization step. In order to promote our country's urbanization level, we should consummate the multi-level financing systems, promote financial support to labor-intensive industry and small enterprises, enlarge the financial innovation in urban public disbursement as well as consummate our country's finance legal framework.

Key words: financial development; urbanization; urban's most-favored population scale; panel data analysis